

绪论 启蒙，中国近代思想的主题

在西方思想史上“启蒙思想”（Enlightenment）主要指的是17~19世纪初在欧洲各地先后兴起的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潮。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有英国的培根、霍布斯、洛克，德国的莱布尼茨、沃尔夫、莱辛，法国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他们在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即将过去的时候，对教会代表的宗教蒙昧主义和封建国家的君主专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并大力宣扬理性和科学。“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①他们认为，宗教神权主义是社会不能进步、人民愚昧落后的重要原因；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树立理性和科学的权威。他们把人的理性作为衡量一切、判断一切的唯一尺度，认为不合乎人的理性的东西就没有存在的权利。因此，宗教神学及其道德都应该统统打倒。他们主张传播科学知识以启迪人们的头脑，认为以经验为检验真理的科学能够使人类正确认识自然，增长知识，破除迷信，从而增进人类的福利。与此同时，他们还强烈地反对封建专制制度，认为封建专制制度扼杀了自由思想，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

造成社会不平等和文化经济的落后。他们大力宣扬民主和法制，强调“天赋人权”，主张人民参与政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张以法律规范人的行为来结束使人们陷入不幸的专制统治的局面。这种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为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产生几乎与西欧启蒙思想的产生同时。在 17 世纪的明末清初，封建社会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已经在封建生产关系的堤坝上打开了缺口，人民的反抗斗争正撼摇着封建统治的大厦。这表明，中国封建社会虽未达到全面崩溃的地步，但矛盾已充分暴露，已经出现了能够“进行自我批判”的特定条件。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了以李贽、方以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戴震等为代表的早期启蒙思想家，并由此形成了中国早期启蒙思想。

在中国封建社会，没有出现如欧洲中世纪那样具有“无可置疑神圣性”的教会势力，因此，与西欧启蒙思潮把批判锋芒主要指向宗教神学蒙昧主义和经院哲学不同，中国早期启蒙思想是以批判宋明理学所极力维护的君主专制制度和伦理纲常为其重要使命。

中国早期启蒙思想与西欧启蒙思潮一样，本质上是一种怀疑、批判、“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精神。早期启蒙思想家首先对宋明理学的“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表示怀疑，主张“非名教所能羁络”，进而对宋明理学的“以理杀人”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他们针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君主是“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的“天下之大害者”，^①并公然表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非未必非’。^①

针对宋明道学的天人合一、存理灭欲的唯心主义伦理观，早期启蒙思想家主张重视人的价值和“人欲”的合理性。他们认为人是天地间“至尊至贵”的，人是自然界的主人而不是自然界的奴仆，自然界的一切“妙用”只有通过人才能显示出来。在此基础上，他们认为人的欲望是天经地义的，肯定“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②反对道学家的禁欲主义，主张尊重人们的合理欲望。

在历史观方面，早期启蒙思想家对传统的“五德终始说”、“三统循环论”、“道统相继论”、“复古论”等进行了理性的批判，对若干历史现象给予了平实、合乎事实的解说，从而形成了一些具有理性主义色彩的历史观。如王夫之提出了“天、理、势合一”的历史观。他认为：“顺必然之势者理也，理之自然者天也”，“天者理而已矣，理者势之顺而已矣”。^③在他看来，顺应历史趋势（势）正体现了历史的发展规律（理），人类历史就是一个理、势统一的自然过程。这一历史观表现了追溯历史发展真实动因的趋向。

有些早期启蒙思想家还以其特有的敏感，对明末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由西方传教士带来的一些西方自然科学知识表示了很大的兴趣。方以智的《物理小识》对明末自然科学知识的介绍，戴震对中国古代数学的总结都反映了这种对自然科学的关注。这种关注丰富了他们的自然唯物主义哲学。同时，他们还痛斥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虚浮学风，主张“经世致用”，提倡面向实际、注重实证的求实学风。

然而，中国 17 世纪的早期启蒙思想远远没有西方启蒙思想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

② 李贽：《焚书》卷一《答邓石阳》。

③ 王夫之：《宋论》卷七。

那样幸运。清朝在全国的统治确立后，封建专制主义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为了自身统治的需要，清朝统治者采取了空前残酷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宋明理学的权威在“御纂”、“钦定”的形式下得以恢复，中西文化交流也由于闭关政策而中断，随之而来的是启蒙思想的天折。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理性法庭”没有导致“理性王国”的建立，甚至它本身也被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字狱”法庭判处了死刑。

在文化专制主义的淫威下，清中叶的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片沉闷而令人窒息景象。一方面，统治者利用“文字狱”来压制反清情绪和异端思想，使广大知识分子“避席闻畏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广大士子或执意揣摩八股时文，以图中举仕进；或苦心钻研故纸经文，讳言本朝政事。另一方面，统治者又大力推崇程朱理学，使知识分子“百经宗孔孟，百行法程朱”，其思想都被笼罩在理学的阴影下。

专制主义虽然压制了社会“自我批判”的力量，但却没有消除社会“自我批判”的条件。恰恰相反，政治上的专制带来的是统治者的腐朽衰落，文化上的专制带来的是统治者的昏庸愚昧，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加剧了农民的贫困，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也在准备着新的“自我批判”的力量。“日之将夕，悲风骤至。”正当清帝国的统治危机日益深化的时候，西方殖民主义又挟坚船利炮破门而入。在日益深化的社会危机面前不甘于寂寞的中国思想界又面临着“海警飘忽，军问沓至”的民族危机。在前所未有的“世变之亟”的刺激下，一部分敏感的知识分子开始将视野从科举场和故纸堆转向矛盾丛生、危机四伏的现实社会。他们一方面继承了 17 世纪早期启蒙思想家的思想资料，另一方面又接受了伴随着殖民者入侵而传入中国的西学思想，从而产生了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近代启蒙思想，并逐步发展为一股社会思潮。

近代启蒙思潮与民主和科学紧密相连，或者说，近代启蒙思潮是以民主和科学思想的传播为其主要内容。民主和科学是世界近代文明的重要表征，是近代资产阶级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应该明确指出的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既没有民主思想，也没有近代科学思想。相对于中国社会，民主和科学都是舶来品。当中华帝国的大门被迫打开时，西方近代民主和科学的思想也伴随着殖民主义的军事、政治、经济侵略而进入中国。这种近代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产生了剧烈的冲撞。在冲撞中，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对民主和科学思想产生了兴趣，再由兴趣到逐渐接受并向国人介绍。当然，这一过程是渐进的、漫长的，并充满着痛苦和误解。然而，这一过程毕竟在进行，人们对于民主和科学的认识也逐渐深化。在民主思想方面，从对西方的议会制度产生兴趣和仰慕，到君主立宪主张的提出，再到民主共和国方案的设计，最后人们认识到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更是一种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和价值观；在科学思想方面，从“师夷长技”阶段对西方“坚船利炮”的羡慕，到西方生产技术引进，再到自然科学知识的传入，最后人们认识到科学并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研究，更重要的是一种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人们对民主和科学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也就是近代启蒙思想不断发展的过程。

民主和科学思想的传入和传播，必然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生激烈的冲突。于是，对封建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也就成了近代启蒙思潮的重要内容。这种批判首当其冲的无疑是与民主和科学相对立的封建专制主义理论和封建蒙昧主义文化。作为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蒙昧主义批判的展开，对封建伦理纲常的批判导致了近代道德启蒙，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导致了近代哲学变革，对传统文学的批判导致了近代文学革命，最后，人们又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精神对自身展开了批判，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的国

民性改造思想。所有这些，如同百川归海，汇入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大洋中，形成了中国近代汹涌澎湃的启蒙思潮。

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又与中国近代经济、政治以及阶级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这一展示了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换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鸦片战争以后的将近半个世纪之内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萌芽阶段。在这一阶段，首先出现了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经世实学派的社会批判和社会改革思想。他们的思想尚未突破其阶级的局限，还不能称之为近代启蒙思想，但却对近代启蒙思想的产生起了“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作用。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作为一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近代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兴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从而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开辟了道路。由于其“中体西用”指导思想的局限，它很难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启蒙作用，但是，它促进了西学（包括近代生产技术、自然科学和一些社会政治学说）的传播，从而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了冲击，尤其是它导致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大量传入中国，为近代启蒙思潮的产生提供了自然科学基础。19世纪70~80年代，从洋务派阵营中分化出一批早期维新思想家，他们在政治上提出建立“君民共主”制度的主张，在经济上主张“以商为本”，进而又有意无意地宣传了“天赋人权”的思想，其启蒙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尽管这种思想存在着涉及范围狭窄、缺乏群众性和社会性等局限，但它却直接为近代启蒙思潮的兴起作了准备。

19世纪90年代的戊戌维新运动前后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兴起阶段。在这一时期，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而兴起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形成。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导致了中国空前的民族危机。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了以救亡图存和发展资本主义为目的的变法

维新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及其前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从哲学、政治思想、伦理道德、自然科学等方面对封建蒙昧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从而成为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潮兴起的标志。

本世纪初到辛亥革命前后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发展阶段。随着清王朝完全成为“洋人的朝廷”和中国半殖民地统治秩序的完全确立，封建专制主义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而洋务运动以来兴起的新式教育培养的一大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近代启蒙思潮的高涨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以孙中山、章太炎、邹容、陈天华、朱执信等为代表，对封建蒙昧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抨击。特别是他们按照资产阶级民主宪政和三权分立等理论设计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案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与此同时，梁启超和章太炎在伦理道德领域相继提出了“道德革命”和“革命道德”的命题，开始接触到“改造国民性”这一近代启蒙思潮的重要课题，从而为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高涨阶段。辛亥革命的失败和民国初年的复古尊孔逆流使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反封建任务的艰巨性。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吴虞、鲁迅等激进民主主义者以“改造国民性”和“唤起民众之最后觉悟”为宗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对封建蒙昧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清算，将中国近代启蒙思潮推向了最高峰。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分化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兴起，中国近代启蒙思潮进入了逐渐衰退的阶段。尽管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资产阶级民主和科学的思想武器变得过时

了，但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并没有轻易放弃自己的思想阵地。经过五四运动后到国民革命失败这一段启蒙思潮的低潮后，20年代末、30年代初启蒙思潮又开始复兴，并汇成了30年代中期的新启蒙运动，但是启蒙已经无法成为时代的主题。新启蒙运动未来得及全面展开，就融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之中。此后，虽有40年代的民主宪政运动和关于自由与自由主义的讨论，但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资产阶级启蒙思潮的终结成了历史的必然。

第一章 “风气略开之后，异学未兴之前” ——鸦片战争后近代启蒙思潮的萌芽

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而来的是被称为“西学”的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各种社会思想。中国传统思想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而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深入，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步形成，中国的民族危机也日益深化。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走上了一条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艰难道路。

鸦片战争后的将近半个世纪之内，正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步形成的时期，也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时期。时代提出了近代化的任务。然而，代表中国近代发展方向的新的阶级力量——资产阶级还没有最后形成，于是，反映时代要求的历史任务就只能由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改革派或从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来承担。

在这一阶段，思想领域相继出现了道咸经世实学派的社会批判和社会改革思想、洋务运动中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思想，以及随之而来的追求科学的理性主义价值观和 19 世纪 70~80 年代早期维新思想家的初步民主思想。这些思想尽管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就其阶级实质而言也未必都属于资产阶级思想的范畴，但它们怀疑旧的传统和封建专制，揭露中世纪的愚昧，提出了一些反映中国社会近代化要求的片断理论和对未来的初步设想，从而开启了一代新的学风，给后世以新的启示，成为近代启蒙思潮

的萌芽。

一 “但开风气不为师”

——道咸经世派的社会批判和社会改革思想

梁启超曾说：“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①他又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②他将晚清新思想的萌芽归功于龚自珍、魏源。确实，龚自珍、魏源等经世实学派的经世致用思想，特别是他们对中世纪封建蒙昧主义的批判，上承明清之交的早期启蒙思想，下启近代新学之风，对以后的洋务派、维新派甚至资产阶级革命派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龚自珍曾以“一事平生无齟齬，但开风气不为师”自任。这也是林则徐、魏源等一代经世实学派的共同抱负和心愿。面对着“万马齐喑究可哀”的黑暗现实，道咸经世实学派的“开风气”就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蒙昧主义造成的腐朽政治和“士林风气”进行激烈的批判。

对封建社会衰败现实揭露和抨击最为激烈的是龚自珍。他对清王朝的衰世进行揭露说：

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蹶。不士、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又或飧菸草，习邪教，取诛戮，或冻馁以死；终不肯治一寸之丝，一粒之饭以益人。承乾隆六十载太平之盛，人心惯于泰侈，风俗习于

^①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

游荡，京师其尤甚者。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①

龚自珍为清王朝这种经济上的贫困感到担忧。然而更使他感到气愤和忧虑的是清王朝政治上的腐败。他认为统治集团充斥着“缚草为形，实之腐肉”，“奄然而无生气”的行尸走肉。他揭露说：

历览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则气愈媮；望愈崇，则谄益固；地愈近，则媚亦益工。^②

这些封建官僚只知道结党营私、作威作福，却毫无治国理政的才能。他在谈到当时朝廷内外人才枯竭的情况时说：

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阍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狙，藪泽无才盗。^③

人才枯竭到了极点，不仅是朝中文武百官无才，而且整个社会士、农、工、商各个阶层都是人才缺乏，甚至连小偷、强盗也都是没有本事的。造成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一是封建的官僚制度，一是僵化的“士林风气”。在当时只重资格、不讲能力的官僚等级制度下，“仕宦者大抵由其始宦之日，凡三十五年而至一品，极速亦三十年”。因此，好不容易得以进入仕途的官僚为了能保住自己的官位，就只有因循苟且，得过且过，或“由退蕙而尸玩”，不求进取，或“朝见长跪，夕见长跪”，以谄媚阿谀来保

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龚定盦全集类编》，中国书店 1991 年版，第 165 页。

② 龚自珍：《明良论二》 同上书 第 133 页。

③ 龚自珍：《乙丙之际箴议第九》，同上书，第 68 页。

住自己的荣华富贵。而在当时“万马齐喑”的政治气氛下，知识分子也养成了一股逃避现实、庸俗僵化的“士林风气”。广大知识分子不敢议论时政，不敢表达真实思想，大家都是“言不由衷”；“万喙相因”。偶尔出现几个“才士”或“才民”，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在这种情况下，当然难以出现真正的人才。

龚自珍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归根结底是由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造成的。因为专制君主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高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使其有力强武”。于是，君主必然“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既殄，既弥，既夷”，^①把天下之士的廉耻之心都消灭了，铲除干净了，怎么能要求官僚有所作为呢？

封建专制统治造成了现实政治的黑暗和冷酷。龚自珍对这种中世纪的黑暗和冷酷进行了生动的描写：“俄然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鼯声，夜之漫漫，鷓旦不鸣。”^②整个社会处在寂然无声、漆黑无光的漫漫长夜之中，听不到不同意见，只听到一片梦呓和鼯声，甚至连最不能忍受寒冷的鷓旦也不啼叫了，谁又能忍受这种黑暗和寒冷呢？龚自珍因此而警告说：“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③

魏源也对清王朝的腐败政治和统治危机进行了揭露和抨击。他认为当时最大的统治危机是“人心之积患”。“人心之积患”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人心之寐患”，即满朝文武的昏庸愚昧状

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一》，《龚定盦全集类编》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98～99页。

龚自珍：《尊隐》，《龚定盦全集类编》第97～98页。

^③ 龚自珍：《尊隐》，《龚定盦全集类编》第97～98页。

况；一为“人材之虚患”，即大小官吏不务实际，专事虚文空谈的作风。他认为清朝的满朝文武大臣和官僚士大夫都是“崑琐中材”、“窳陋之臣”、“腐儒鄙夫”。他们虽然满口心性义理，但对国计民生毫不关心。“朝野上下莫不玩细娱而苟近安，安其危而利其灾，甚至鬻熟为才，模棱为德，画饼为文，养痍为武，头会箕敛为富。”^①他认为造成这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人才培养、选拔和使用制度，特别是八股科举制度。他抨击科举制度“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即使通过科举考试当上了翰林，其本事也只是“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②

针对清王朝这种“万马齐喑”的黑暗现实，龚自珍、魏源等大声疾呼要“不拘一格降人才”，要祛除“人心之寐患”和“人材之虚患”，也就说要从思想上把人们从昏睡愚昧的状况中唤醒，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如何才能打破当时专制愚昧的局面呢？龚自珍提出“九州生气恃风雷”，魏源也呼吁“何不借风雷，一壮天地颜”。他们所希望借重的“风雷”是什么呢？由于其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希望一场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风暴的出现。他们希望的是清王朝能“更法”、“变古”。而从思想文化方面而言，他们希望广大知识分子从思想钳制和蒙昧主义的阴影中冲出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吁正反映出他们对一场思想解放的企盼。

龚自珍曾主张私人议政权。他说：

夫有人心必有胸肝；有胸肝则必有耳目；有耳目则必有上下百年之见闻；有见闻则必有考订同异之事；有

① 魏源：《默觚下·治篇十一》，《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6页。

② 魏源：《默觚下·治篇一》同上书，第37页。

考订同异之事，则或胸以为是，胸以为非，则必有所感慨激奋。感慨激奋而居上位，有其力，则所是者依，所非者去。感慨激奋而居下位，无其力，则探吾之是非，而昌昌大言之。^①

这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根据自己的所闻所见、自己的考察判断来评论政治的权利和自由。他并没有主张“参政权”的平等。在他看来，“居上位”者和“居下位”者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考察分析所作的是非判断，对政策制定和实行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但他主张“议政权”的平等——即使是“居下位”者无力按自己的是非判断来制定和实行政策，也应该将自己的是非判断公之于众，“昌昌大言之”。这无异于一份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宣言，对当时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无疑是一种大胆的否定。

同样，魏源也主张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他认为天子和庶民都是自然界“五行之秀气”凝聚而成，因而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天子者，众人所积而成……故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斯视天下为天下之天下。”^② 他还把整个社会比喻为一个人的身体，天子只是社会的“头脑”，而百姓则是维系社会存亡的“呼吸器官”。因此，他强调天子要让庶民参与朝政，要允许百姓上书言事，而天子则应采取各种方式来倾听、接受百姓的意见。他还把言论自由作为判断社会政治是否清明稳定的标志。他说：

景运之世，言在都俞，其次言在旌木，其次言在庭陞，其次言在疏牖，其次言在歌谣，其次言在林藪，其次言在腹臆。言在腹臆，其世可知也。^③

也就是说，如果在京城里也能自由地议论朝政，就是清明吉

龚自珍：《上大学士书》，《龚定盦全集类编》第 189 页。

② 魏源：《默觚下·治篇三》，《魏源集》上册第 44 页。

③ 魏源：《默觚下·治篇十二》，同上书，第 68 页。

祥之世；如果人们只能到山林水泽中去议论朝政，甚至只能把意见憋在心里不敢讲出来，那么统治就非常危险了。因此，他针对八股科举考试的空疏无用，提议“大开直言之科”，让士人和庶民有说话的机会和场合。

经世实学派对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批判还表现在他们对人的自我意志和个性自由的肯定态度方面。在这方面，龚自珍有一段著名的议论：

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圣人也者，与众人对立，与众人为无尽。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变造毛羽肖翘，我理造文字言语，我气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别造伦纪。^①

在他看来，众人不是圣人创造的，而是自我造化的。因此，众人不要受什么“天道”、“太极”的主宰，而应该自己主宰自己。虽然，他片面地夸大了众人“自我造化”的作用，甚至把天地万物都看做众人造化的结果，不免陷入佛学唯心主义。但他强调众人的作用，主张众人摆脱“圣人”、“天道”、“太极”的控制，却孕育着强调个人自由，主张人性自由发展的人文主义因素。

龚自珍还进一步提出了“自尊其心”和“宥情”、“尊情”的主张。他认为，人要有自己的尊严，首先必须“自尊其心”，也就是要有自己的个性。他说：

心尊，则其官尊矣；心尊，则其言尊矣。官尊言尊，则其人亦尊矣。^②

龚自珍：《壬癸之际胎观第一》，《龚定盦全集类编》第107~108页。

^② 此段话《龚定盦全集类编》为：“心尊，则其言亦尊矣。心尊，则其官亦尊矣。心尊，则其人亦尊矣。”现据《传世藏书·集部·别集》所收《龚自珍集》改。

要做到有自己的个性，就要“心之向背趋舍其定矣”，即有自己坚定的信念；要“心术不欺，言语不伪”，要以自己“本来如是”的真面目面对社会。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宥情”、“尊情”的主张。他说：

情之为物也，亦尝有意乎锄之矣，锄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①

他认为人皆有情有欲，这是与生俱来的，即使“有意乎锄之”也不能去掉。只有对这种情欲予以宽容和尊重，让人们真实感情和欲望自由地表达出来，同时，也只有“各因其性情之近”，才能培养出各具个性的各方面人才。从这些只言片语中，我们不难看出其中所包含的主张个性解放的要求。

魏源也认为人可以自己创造自己的命运。他认为，任何人都先天存在一种“本觉灵明”，这种“灵明”的本来来自于天，每个人都相同，因此，“人人可以为日，可以为月”，^②关键在于人们是否能“造化相通”、“自造自化”。^③也就是说要自己掌握自己，充分发挥人的自我创造能力，就可以“造化自我”。他说：

匹夫确然有志，天子不能与之富，上帝不能使之寿，此立命之君子，岂命所拘者乎？人定胜天，既可转贵富寿为贫贱夭，则贫贱夭亦可转为贵富寿。……祈天永命，造化自我，此造命之君子，岂天所拘者乎？^④

在这段充满着唯意志论色彩的论述中，我们却可以看到，对“造化自我”的“造命之君子”的赞美实际上是对人的价值的肯定。从肯定人的价值出发，魏源还认为对于人的各种自然欲望不

龚自珍：《长短言自叙》，《龚定盦全集类编》，第18页。

② 魏源：《默觚上·学篇五》，《魏源集》上册，第14页。

魏源：《默觚上·学篇二》同上书，第6页。

魏源：《默觚上·学篇八》同上书，第21页。

能强行压抑，而应该适当满足：

常人畏学道，畏其与形逆，逆身之愉而使重，逆目之治而使闇，逆口之荡而使默，逆肝肾之横佚而使平，逆心之机械而使朴，无事不与形逆，矫之，强之，拂之，阨之，其不终改者几希矣。语有之：“愆忿如摧山，窒欲如填壑。”乌有终日摧山填壑而可长久乎^①

他认为强行压抑人的各种欲望（即“与形逆”）是违背人的本性的，因而也必将失败。为此，他提出对这些欲望“不主逆而主复”即所谓“反情复性”使人的各种情欲符合“心”的本性的要求。尽管他并未否认“心性”对于人们欲望的节制，然而值得指出的是，他否认了宋明理学将“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的观点，肯定了人的各种欲望的合理性。这应该说是一种具有鲜明人文主义色彩的观点。

龚自珍、魏源等经世实学派人士都反对汉学的脱离实际和宋学的空疏无用。他们主张面对现实，研究有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正因为如此，他们摆脱了汉宋相互责难的争论，从书斋走向实际，对一系列有关国计民生的经济、财政、水利工程等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并提出了许多富于创见的改革建议。这些建议往往还包含着一些科学的成分。如包世臣在《筹河四略》中提出的御坝和浚淤并举的治河方法、魏源关于黄河将从黄海入海改道为渤海入海的预测、李祖陶在《东南水患论》中关于盲目围湖造田造成长江连年水患的分析。这些都是经得起实践和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从这些真知灼见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到经世实学派思想中的理性主义因素。

然而，更能体现经世实学派思想中理性主义因素的是他们面对西方殖民主义入侵和西方文化的传入，而形成的对中国和世界

^① 魏源：《默觚上·学篇四》，同上书，第10~11页。